



*Seeking rich and the Chinese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rn economics*

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
——《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

张登德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
刊与传播:英汉对照/张登德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9.9

ISBN 978 - 7 - 5461 - 0799 - 8

I. 求… II. 张… III. 富国策—研究—英、汉 IV. F095.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939 号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总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10.75

字 数:300 千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1880 年以前中国人眼中的西方经济学	1
第一节 来华西人对西方经济学的引介和传播	4
第二节 中国人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早期认识与传播	8
第二章 《富国策》:晚清西方经济学系统输入之开端	14
第一节 京师同文馆与“富国策”之输入	14
第二节 文本溯源:《富国策》的翻译和出版	33
第三章 《富国策》的主要内容	96
第一节 《富国策》原著之框架体系和特点	96
第二节 《富国策》的中心思想	99
第三节 西方主要经济学家理论之译介	141
第四节 《富国策》内容之评价	154
第四章 汪凤藻《富国策》的翻译研究与检讨	
——与法思德原文之对照比较	161
第一节 学者对《富国策》翻译的讨论	161
第二节 翻译过程	164
第三节 翻译总评	177

第五章 《富国策》与其他著作的关系	183
第一节 《富国策》与《重译富国策》	183
第二节 《富国策》与《无锡白话报》推演之《富国策》	207
第三节 《富国策》与《续富国策》	215
第四节 《富国策》与《富国须知》	232
第五节 《富国策》与《原富》	239
第六节 《富国策》与《佐治刍言》、《富国养民策》	247
第六章 《富国策》的传播和影响	252
结语	282
参考文献	289
后记	299

序

“富国策”原是晚清较为流行的经济学中文译名。19世纪70年代,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时,曾开设“富国策”即经济学课程,并以英国经济学家法思德(Henry Fawcett)的《政治经济学提要》(*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为教材。1880年,在丁韪良督率下,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将该书以《富国策》之名翻译出版。《富国策》问世后,不仅被其他学校沿用,而且社会各阶层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介绍和评价。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富论》、《资本论》等经济学译著关注较多,而对《富国策》的研究既不系统,成果也有限,而且还有很多误解之处,难以反映出《富国策》的全貌和其所蕴涵的价值。这与其作为近代中国首部经济学译著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对《富国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借以考察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不仅对拓展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也有帮助。

张登德同志在2000年至2003年跟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曾涉猎《富国策》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陈炽研究》中的“《续富国策》和《富国策》关系研究”一章就与此有关。但是限于论文选题,许多与“富国策”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展开论证。毕业后,他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继续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并加以梳理、考证,终于完成这一译著的研究,弥补了学术界的不足。这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部研究《富国策》的专著,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西方经济学说是何时传入近代中国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作者尽可能地搜集到了这些观点,并对19世纪80年代之前外国人和中国人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和认识进行了梳理。这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播是有帮助的。作者还从京师同文馆、总理衙门、丁韪良等层面分析了选择翻译《富国策》的原因;对原著者法思德的生平与著作、“富国策”译名以及《富国策》的翻译蓝本、出版时间、译著者等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辨析,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尤其是在分析法思德的思想源流时,作者不仅将其与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比照,而且将译本中的“葛氏”、“拔氏”、“羊氏”、“斯氏”、“韦氏”、“童氏”、“柏腊息氏”等令人费解的人名进行了考证和介绍。这给读者阅读《富国策》时提供了方便。

《富国策》出版之前,中国人所接触的西方经济学多为一些普通的常识,理论价值不大。《富国策》则把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理论系统完整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此后经济学观念开始影响到中国的知识界和决策者。本书对于《富国策》中的财富、赋税、货币、交换、分配、自由贸易等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详细分析。同时,对亚当·斯密的分工和赋税学说、大卫·李嘉图的地租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和评价,并指出这是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首次传入中国。这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作者所做的分析妥帖,多有补前人未及之处。

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人是怎样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将原文与译本对照分析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本书通过双语式的比勘分析,指出汪凤藻的译文与原著之间存在着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对原著内容的大量删削;二是译文中掺杂了不少汪凤藻的意见;三是对原著作了一些调整。同时论证了汪凤藻虽然不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出身,但是他具有良好的英语和中文水平,还是将《富国

策》中所阐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本上翻译出来了。做这种文本的对照分析需要平心静气和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方能有所作为。作者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找到了《富国策》的英文原本及其他版本,《富国策》译本的不同版本,并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使结论建立在翔实可靠的基础之上。作者所做的这些工作,表明了其治学态度的严谨,是值得赞许的。

本书的研究体现了作者具有较开阔的视野。作者不限于研究《富国策》本身,而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富国策》与《重译富国策》、白话文本《富国策》、《续富国策》、《富国须知》、《原富》、《佐治刍言》、《富国养民策》进行了比较分析,使得这项研究更有深度,所做的结论也是可信的。

作为京师同文馆的经济学教材,《富国策》不仅供馆内学生使用,而且免费送给全国官员阅读。作者用较多的篇幅论证了《富国策》的传播和影响,指出:《富国策》出版后,有多种版本问世,许多报刊书目予以介绍评论,表明《富国策》传播范围;影响了中国士人的价值观,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促进了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建立;引发了经济学著作翻译的热潮;成为外国人著书说理的重要依据等。同时,从受众群体、该书内容、传播媒介等方面剖析影响《富国策》传播的因素,作者不囿成说,其中不乏精当之论。

人无完人,书也没有完书。本书也存有不足之处。诸如,对某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的分析不够,书中某些文句也有值得推敲之处。

关于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大课题,希望登德同志在研究完《富国策》后,能够继续对其他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译著进行探讨,为繁荣我国学术作出更大的贡献。

龚书铎

2009年6月8日

绪 论

1901年,严复在翻译《原富》所作的“译事例言”中说:“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①此处“计学”即现在的“经济学”。^②1930年,唐庆增在《大学经济课程指导》中说:“社会科学对于现代文明贡献之伟大,实不亚于自然科学,而在各种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实占极重要之位置。自原始时代,迄于今日,人类殆无一日能脱离物质的生活,凡属人类,皆不能不努力以求生存,生存之唯一要素,厥为欲望之满足,故世间无论智愚贤不肖,不能脱离经济社会而自能生存。”^③严氏、唐氏之语皆说明了经济学对国计民生和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古代虽然不缺乏经济思想,但是在传统“重农抑商”的环境下,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产生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从西方逐渐传入的。

在探讨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之前,我们不妨先

① [英]亚当·斯密著、严复译:《原富》(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

② 严复用“计学”的理由是:“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见严复为翻译《原富》所作的译事例言。

③ 唐庆增:《大学经济课程指导》,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1页。

从“经济”一词谈起。

“经济”、“经济学”、“经济之道”、“经济之学”之类的词,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西晋时期,人们开始使用“经济”一词。^①《晋书·长沙王乂传》载,公元303年,西晋“八王之乱”后长沙王司马乂曾致书其弟,说他们“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东晋时期,晋元帝在褒奖大臣纪瞻的诏书中说:“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晋书·纪瞻传》)南北朝时《宋书·蛮夷传》记述宋文帝因克林邑后嘉诏:“龙骧将军、交州刺史縯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经济。”隋唐以后,“经济”一词用得更为普遍,而且出现“经济学”一词。例如,隋代学者王通《文中子》卷六“礼乐篇”中所记“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唐朝诗人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有:“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中唐诗人严维《秋日与诸公会天寺》有“还将经济学,来问道安师”等诗句。

宋代以后出现了许多以“经济”命名的书籍。如宋人滕珙的《经济文衡》、元人李士瞻的《经济文集》、明人陈子壮《经济言》等。清中叶后,“经济”之学逐渐为关心国计民生的士大夫所重视。曾国藩主张在传统学术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他在1869年所写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将孔门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科,并指出:“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提出“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②此后,张之洞也曾多次提到“经济”之词。例如,1874年张之洞在《輶轩语》谈到士子学习时应“讲求经济”,“讨论本朝掌故,明晰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1891年11月,他在《设立自强学堂片》中指出:“志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1895年7月,他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指出:

① 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②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科目出身者，毕生困于考试，见闻狭隘，精力销磨，以致未能尽娴经济，若洋务、军务，更难语此”；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再次批评在科举制度下，士子“不通古今，不切经济”，“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从而提出变革，“以中西经济救时文”，“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①刘锡鸿在日记中说：“乾嘉以前，虽以时艺取士，而文字必具有根柢，窥见学问经济之蕴，乃能誉望重一时”，后来“应举之人，不必诵习经史语录，不必讲求学问经济之理，而惟取时文之习套，略观而摹仿之，即可自谓文士。”^②1897年10月，贵州学政严修曾建议朝廷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经济特科”，以策论时事。后来总理衙门和礼部将严修所说“经济”归纳为：“一曰内政，凡考求方輿險要、郡国利病、民情风俗诸学者隶之。二曰外交，凡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诸学者隶之。三曰理财，凡考求税则、矿产、农工、商务诸学者隶之。四曰经武，凡考求行军布阵、驾驶测量诸学者隶之。五曰格物，凡考求中西算学、声光化电诸学者隶之。六曰考工，凡考求名物象数、制造工程诸学者隶之。”^③1898年1月，皇帝颁布上谕，正式开行经济特科。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发出懿旨：“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到清末新政期间，清廷推行经济特科考试，选取人才，并未取得多大效果。

晚清入华的传教士也使用“经济”一词。如林乐知1875年9

① 分别见陈山榜：《张之洞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3、114、224—225页。

② 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25页。

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的《中西关系略论》中,便有“尧舜禹汤之经济”一类句式。另外,晚清应祖锡辑的《洋务经济通考》在光绪24年(1898)、27年(1901)、28年(1902)由上海鸿宝斋三次以石印本出版;果尔敏编的《中外时务经济新论》光绪24年(1898)石印本出版。20世纪初年,求自强斋主人编辑128卷《皇朝经济文编》、宜今室主人编的62卷《皇朝经济文新编》先后出版。可见,“经济”一词在晚清已有广泛的使用度和范围。

“经济之学”一词最早见于《朱子语类》。该书卷136评价《陆宣公奏议》中有:“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明史·选举志一》记述明太祖洪武初从国子学中选拔人才“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清人讲“经济之学”并不罕见,如《清史稿·曾钊传》记他“好讲经济之学。”清初陈迁鹤(1639—1714)在《储功》中讲到:“是以性命之学与经济之学,合之则一贯,分之则两途。”1887年,张之洞在《创建广雅书院折》中指出:调集广东、广西两省“诸生才志出众者,每省百名,肄业其中,讲求经义、史事、身心、经济之学,广置书籍以备诵习。”“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①1889年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说“文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这是所见“经济之学”的用法。

张之洞也多次使用“经济学”一词。1889年11月,他在《札广雅书院提调设立分校》中指出:原来书院内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类都由院长一人负责,“事繁责重,几至日不暇给,未免过于劳瘁”,因此在书院院长之下,另设立四所分校,帮助院长阅卷讲授,“原定章程,经济专立一门,词章归于兼习,此教人之法,理应崇实黜华。至设立分校,则史学可包括经济”,因“专以经济名家者,世罕其人,亦难以专立一师,今定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分设四馆,经济学附于史学馆内”。1891年2月,他在《咨南、北学院调

① 陈山榜:《张之洞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两湖书院肄业诸生》提出创建两湖书院,“课士之法,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延请分教六人,专门训练诸生。”1891年6月,他在《札江汉关道另设学堂讲习方言商务、酌量分拨商籍》中指出:“查两湖书院,设有算学、经济学两门,讲求时务,本已包括其中。”^①这是清末首次出现“经济学”的用法。

不过,上述用例所用“经济”或“经济之学”、“经济学”一词,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并不是一回事。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是指国民经济或部门经济以及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以及金融、保险等活动或过程。而中国最初所用其内容基本上不出“经世济物”、“经国济民”、“经邦济国”等传统之意,不仅包括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而且也包含国家如何处理政治、军事、法律、教育等“治国平天下”的有关知识和学问。显然,当时“经济”之学从属于政治伦理道德,所有的学问只是“偏重于政治”^②,“片段之经济思想与政策,散见于历代各家集部,概乏整然之体系,且立场多半拘于伦理,鲜有从经济观点出发者”,“在伦理的著作中论经济,且以伦理的观点论经济,所谓‘为道德而谋经济,非为经济而设道德。’”^③胡寄窗也说:“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在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一般均服从于伦理要求”。^④即上述“经济”、“经济学”的内涵都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而不是“economy”、“economics”之义。

首先用汉字“经济学”一词翻译“economics”的是日本人,后来中国人把这个西文日译的词“译”回了中国。1896年11月11日《时务报》登载古城贞吉译日本《东京经济杂志》,文有“经济”一

① 陈山榜:《张之洞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5、83、91页。

②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第17页。

③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65、54页。

④ 《胡寄窗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词,并加小字注明“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同年12月15日该报刊登译自《东京经济杂志》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将篇目与学科名一起搬到了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虽然所待时间不长,但他对日本之发展感触良多,指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①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发表《格致学沿革考略》指出:“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行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②明确了“经济学”在西学中的独立地位。1903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教坛上开讲“经济学”,使今义的“经济”和“经济学”得以普及。然而,因为此词的新义与古典义相去甚远,“经济”一词直至辛亥革命仍未被中国人广为接受。

“经济学”一词最终在中国取代其他译名,与孙中山的提倡有密切关系。鉴于当时表述经济学的词汇有“计生学”、“计学”、“平准学”、“理财学”等各种称谓,1912年10月,他在北京作讲演论及解释economy的译名时说:“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学家也。兴盐鱼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统系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③在其他场合,孙氏也讲过类似的话。此后,经济、经济学成为economy和economics的通用译名,包含社会生产、交换、分配、

①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② 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③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消费等内涵,与古典的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义分道扬镳。然而,经济学与富国策、计学、理财学并用,延续了一段时间,中国第一位留美经济学博士马寅初 1914 年所撰博士论文,便不用“经济学”一词,而用“富国策”、“计学”,表现出对“经济学”这一译名的保留态度。^① 大约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及经济学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

在中国,“经济”一词的接受有一个过程;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对“经济”概念的理解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经济学”的希腊文词根写成英文就是“econ-”,主要意思是家政管理之意。18 世纪以前,经济学在欧美各国尚未形成科学的体系。古希腊人很早就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更是提出了较有特色的经济思想。公元前 4 世纪,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约前 430—前 355 年)的《经济论》,其书名原是希腊文,原意是“家政(或译家庭、家务、家计)管理”,所以此书又称《家政学》。英文的“economy”一词就是从希腊文这个词演变而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经济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研究家庭关系,一是研究致富之术。中世纪以后,僧侣的经院哲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中虽然包含某些经济理论的要素,但是从总体上还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西方的“经济”虽然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但也含有管理城邦国家等与“经国济民”相似的内容,并带有伦理道德、情感哲理的色彩。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 年)之前就写了《道德情操论》(1759 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也就是说,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

^① 冯天瑜:《汉字术语近代转换过程中的误植现象辨析:以“经济”、“封建”、“形而上学”为例》,载于刘柏林、胡令远:《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8 页。

含义蕴于其中,都与今天的“economics”有不同,经济与政治以及伦理道德很难分开。于是,中国出现“富国策”等、西方出现“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是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A. de·蒙克莱田(约1575~1621)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此书是为治国献策的,所论已超出家庭生活、家族管理范围,而广泛涉及社会治理、国计民生问题,包含政治内容。英国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72年在《爱尔兰政治剖视》(*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书中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755年,卢梭(J. J. Rousseau)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作了区分。1767年,詹姆斯·斯图亚特(J. D. Steuart)写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广为沿用。不过,在西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常被看做是同义语。不论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两者也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看做是同义语:“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①

就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的。重商主义是当时商业资本思想和要求的代表,它的产生适应了资本主义生长中对货币的积累和扩大市场的需要,是资产阶级早期的经济学说。这种学说和体系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一直到1800年,几乎经历了大约三百年

^① [英]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编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70页。

的历史。它以流通领域为研究对象,研究商业和海外贸易问题,认为金银是唯一的财富。因此,为了增加金银财富,就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实现顺差,以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例如,英国晚期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说:“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①因此,它要求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和利用税收等手段,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工商业。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重商主义者的注意力主要局限在流通领域,错误地认为利润只在流通过程中产生,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学说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受到了重农主义的严厉批判,后随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而逐渐衰落。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②到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处于最后瓦解阶段。同时,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并逐渐确立了海上霸权。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一起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与此相应,资产阶级在哲学领域也提出了新的观点,否认任何非物质实体的存在的世界观,只有研究自然,发现自然固有的规律,才能征服自然。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iam petty, 1623—1687)逐渐摆脱重商主义影响,把研究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进行了全面理论探讨,谋求探索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自

① [英]托马斯·孟著、袁南宇译:《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6页。

然规律”,成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和创始者。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了批判重商主义理论,反对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主张政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等见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也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形成。所以,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①大卫·李嘉图在承继斯密理论中科学因素的基础上,于1817年在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中,提出劳动价值理论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分配学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和研究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分配的规律。之后经过法国的萨伊、英国的马尔萨斯,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别在法国和英国加以普及,古典的经济自由理论逐渐取代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论点,成为18世纪70年代后大约100年间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主流和正统。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奠定了其在古典经济学的地位,同时成为集大成者。因社会经济之急变,知识环境之开展,英国古典经济学自约翰·穆勒之后,渐呈式微之势。1863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亨利·法思德创作《政治经济学提要》,进一步发挥了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有鉴于学术之颓废,毅然以复兴正统派为己任,而倡导新古典派之学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出现了以萨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使研究对象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种生产方式,被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在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1页。